

《红楼梦》研究问题 资料选编

杭州大学中文系
《红楼梦》研究资料组

《红楼梦》研究问题 资料选编

杭州大学·中文系
《红楼梦》研究资料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关于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仇河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
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
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
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

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 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

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

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目 录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 (1)

曹雪芹和《红楼梦》 李希凡 (6)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 (51)

评《红楼梦》 徐锡熙 (62)

《红楼梦》——四大家族衰亡史 (选载)

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

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

四大家族的衰亡史 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

..... 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 (81)

附 录

《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反动言论摘编

..... 杭州大学中文系《红楼梦》研究资料组 (119)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蓬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 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论睁了眼看》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坟》，
《全集》第一卷第330页。）

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記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

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怎么写》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三闲集》，《全集》第四卷第20—21页。）

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象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集外集》，《全集》第七卷第103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是。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正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唯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

令人觉得诧异。宝黛下狱并不实，原书《红楼梦》《红楼梦》中，来文并未有，实为《红楼梦》小引》。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集外集拾遗》，《全集》第七卷第419页。）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心集》，《全集》第四卷第164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言论自由的界限》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伪自由书》，《全集》第五卷第94页。）

人品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

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谈金圣叹》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南腔北调集》，《全集》第四卷第403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草鞋脚〉小引》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且介亭杂文》，《全集》第六卷第16页。）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

《看书琐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六日（《花边文学》，《全集》第五卷第429—430页。）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

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出关〉的关》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第六卷第423页。）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末编》

《全集》第六卷第423页

《出关》是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是老子。老子是周朝的一个哲学家，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战争和暴力。在《出关》中，老子被描绘成一个孤独、沉默、充满智慧的人。他离开周朝，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战士，名叫关公。关公是一个充满激情、勇敢的人，他想要改变世界，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做。老子告诉关公，改变世界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智慧和耐心。关公听了老子的话，感到非常困惑，但他决定听从老子的建议。他放弃了战争，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最后，关公明白了老子的意思，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去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思考他的问题。《出关》是鲁迅先生对老子的哲学思想的一种探索，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反思。

曹雪芹和《红楼梦》

李希凡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最初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王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传抄、流传，到了十八世纪末，才有高鹗、程伟元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刊行问世。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间，曾经盛传过这样的谚语：“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此后，就出现了穿凿附会的“索隐派红学”，大搞“索隐”、“抉微”，拚命想从这部小说中寻求所谓“微言大义”，“抉”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新红学派”。他们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大肆推销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行反对革命、毒害青年之实。

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

“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狂热鼓吹什么“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以及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的伪“科学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适根据他这种“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进行“小心的求证”，在他的《红楼梦考证》里，分析研究《红楼梦》的结果，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红楼梦十二支曲”、“风月宝鉴”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处。

（三）《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这种“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

然而，实用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的，因为胡适的这种孤立的、狭隘的、离开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真面目。

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里，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亦步亦趋。据俞平伯自己讲，在胡适提出这些主张以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后，“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

感染到我”。从此，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讨论《红楼梦》，以实践他们的主张了。俞平伯一会儿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一会儿又宣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它的“基本观念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甚至从所谓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的形式主义考证出发，推断出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实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适所考证出来的结论加以扩充吹涨，本末倒置地把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变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上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互相比附，使《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被割裂成从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的事实碎片，妄图用这种不可知论的“自传说”，把文学青年引进烦琐考证的迷魂阵里去，以便于“无形中，养成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用主义的信徒。

“新红学派”特别是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假借“整理国故”研究古典小说，大肆贩卖这一套反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胡适曾毫不掩饰地声明：“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并恶毒地叫嚣：“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而，他们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狂热鼓吹：“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涣散斗志的罪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但是，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新红学派”，

却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统治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又同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勾结起来，继续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妄图顽固地保持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一九五四年五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周扬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大肆美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是有“抱负和理想”、“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吹捧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奴颜婢膝的可耻面目。

正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支持和利用下，俞平伯把他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红楼梦辨》稍加改动，易名《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复散播胡适派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而《文艺报》，却在它的“新书刊介绍”的专栏内，狂热吹捧《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它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在进行疯狂反扑。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呈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就是突出的例证。因而，“新红学派”反动观点的泛滥，只不过是这场激烈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